



大图：“山西娃娃”王东平老人说，他一直珍藏着由斯诺签名的书——《西行漫记》。

小图：作者曹新旺与“山西娃娃”王东平老人合影。



《西行漫记》中斯诺笔下的“山西娃娃”王东平。

我与“山西娃娃”的故事

■ 曹新旺

近日搬家整理书籍,《西行漫记》中的那张小红军战士的黑白照片,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,它勾起了我对照片上的主人翁,斯诺笔下的“山西娃娃”——王东平老人的怀念之情。

1998年,我在山西省临汾市原63集团军某师宣传科当新闻干事。这年夏天,我到临汾市民政局办事,无意中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5寸黑白照片,很明显那是一张翻拍的照片。出于好奇,我就多瞅了几眼,并多嘴向他们问了一句:“这照片上的小孩是谁?”

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随口说:“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位老红军干部!照片是他12岁当红军时照的,听说这张照片还是写《西行漫记》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照的。《西行漫记》里还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呢!”

“什么描写?”我诧异地问。

女同志说:“具体内容我也不太清楚,只知道书里专门写过他。”

很惭愧,我当时只知道《西行漫记》这本书,并没有读过。但这个消息的确让我异常兴奋,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线索——如果消息是真的,那将会解密一段尘封的历史!

我越想越兴奋,当时就想详细地问问我来龙去脉。很遗憾,这位女同志知之甚少。她看我有些着急,就把这位老红军的家庭住址给了我,让我自己去找找看!

我拿着地址,如获至宝……

第二天一早,我让秘书科的李振宾干事派了一辆北京吉普,然后,一起到临汾市的襄汾县城关镇柴庄村去寻找这位斯诺笔下的“山西娃娃”——王东平老人。

“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,长着一张娃娃脸,只有12岁,但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……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,他说:‘红军为穷人打仗,是抗日的,谁不想当一名红军战士?’”这是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对王东平老人当红军时的描写。我连夜找来《西行漫记》这本书,并在书中找到了这段关于王东平老人的描写。

几经周折,我们终于寻访到了这位让斯诺大书一笔的“山西娃娃”——王东平老人。

抚今追昔,我走进了王东平老人那鲜为人知、富有传奇色彩的峥嵘岁月……

在与老人的交谈中,我了解到了许多难得的、珍贵的历史故事。

王东平,原名王月(越),乳名月娃子,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关镇北关

村。他刚满3岁,母亲就离开了人世;10岁时,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。月娃子在邻居的帮助下向县牛奶厂的张老板借了5块银元,买了一口薄棺材,含泪埋葬了父亲。3个月后,张老板按“驴打滚”的高利贷把5块银元翻成了50块银元。10岁的月娃子无法偿还,只好到牛奶厂当童工抵债。在厂里,月娃子受尽虐待。

1936年春天,红军从陕北东征过黄河打到了洪洞县,牛奶厂张老板闻风携家眷落荒而逃。月娃子趁机与两个小伙伴逃离了工厂,回到村里。村里已入驻红军,他们不知红军是什么的,便躲着红军走。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,红军并不打骂他们,相反远远地就与他们打招呼、逗他们玩。他找到时为地下党员的表哥张吉祥,从表哥那里得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,是老百姓的队伍。在红军驻扎的日子里,他自告奋勇地为红军带路,传递口信。时间长了,红军战士特别喜爱这个勤快聪明的小孩,他也产生了当红军的念头,天天缠着王连长要求参加红军。王连长实在拗不过他,就把他留在身边当通讯员。他成为一个年仅12岁的小红军。

到达陕北保安后,首长看月娃子诚实又机灵,就把他调到内务警卫连,给罗瑞卿、何长工、杨尚昆担任警卫员。在这里,月娃子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。他负责首长的日常生活的勤务保障,虽然年龄小但责任心特别强,又聪明,大家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娃娃,称他为“山西娃娃”。

1936年6月的一天,月娃子正在晾衣服,突然看到院子里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大个子。从没见过外国人的他吓了一大跳,远远地躲在一边好奇地打量。过了几天,他才知道这个大个子是从美国来的记者,叫斯诺。首长把他叫到身边,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:负责照顾斯诺的生活起居。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:“小鬼,斯诺先生是外国人,是咱们中国人民的朋友。你要好好照顾他,要热情诚恳耐心,还要守纪律等等。”他把周副主席的话一一记在心头。

斯诺个大身长,睡在床上时,脚老伸在床外,只好屈着腿睡。月娃子跑了大半天,为斯诺扛来一张床板,给斯诺支成大床铺。看到长长的床铺,斯诺拉着月娃子的手,一连说了几个“OK”和“谢谢”!时间一长,月娃子与斯诺混熟了,他便经常与这个汉语讲得不怎么样的外国人拉家常。斯诺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讲外国笑话,常常逗得他前

俯后仰。

有一次,斯诺患了重感冒,可当时我军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,斯诺吃了几片药以后没什么好转。看着床上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外国朋友一脸痛苦的表情,月娃子悄悄地出去找来半截白萝卜、生姜和一把野葱。月娃子把萝卜、生姜切成片,把野葱留须放在一起熬汤,把熬好的汤汁端到斯诺面前说:“这是我们家乡治感冒的土办法,你喝下去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觉就好了。”

看着月娃子那挂满汗珠的小脸和沾满炭灰的一双手,斯诺感动得流下了泪水,他把这碗汤汁一饮而尽。第二天,他竟奇迹般地好了。斯诺说:“这是月娃子感动了上帝,我的病才得以好转。”他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大笑,把月娃子抱起来转了好几圈,转得月娃子晕头转向……

有一次,斯诺与月娃子拉家常时问:“你为什么要当红军?”月娃子一听斯诺提问,调皮地说:“你是不是在采访我呀?”月娃子满脸的认真劲,把斯诺逗乐了:“Yes,我现在正式宣布对月娃子进行采访。”月娃子说:“红军为穷人打仗,是抗日的,当一名红军战士多光荣啊,谁不想当一名红军战士!”后来,斯诺把这段话写进了《西行漫记》,而且对月娃子有一段描写:“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,长着一张娃娃脸,只有12岁,但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。”

王东平老人说,当时根据地的生活相当清苦,斯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,也只能吃到小米饭加两个菜。吃饭时,斯诺经常到其他首长那里转转,看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吃住竟是那样艰苦,但斗志是那样的高昂,他经常感动得流泪。在他的报道里,红军的生活是清苦的,纪律是严明的,队伍是伟大的。斯诺经常把菜让给月娃子,月娃子说啥也不要,说这是纪律!一听是纪律,斯诺只好点点头,不再坚持。

转眼4个月过去了,1936年10月的一天,月娃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儿,斯诺把他叫到跟前说:“山西娃娃,我该走了,我给你照张相吧!”从没照过相的月娃子,一听说要给他照相,高兴得直跳。他虽然负责斯诺的生活起居,看到相机也挺眼熟,但从没有提过让斯诺为他照张相。月娃子赶忙整一整肥大的军装和武装带,笑嘻嘻地把头一歪,只听见“喀嚓”一声,照好了。照完相的第二天,月娃子为斯诺收拾好行李,含泪与斯诺依依惜别。临行时,斯诺紧握着月娃子

的小手说:“我爱中国,我爱你们,我还会再来的,谢谢你这些天来对我的照顾。”月娃子双眼含泪使劲地点点头。

后来,罗瑞卿、何长工两位首长把他们和斯诺共同签了名的《西行漫记》送给王月平,他才知道自己就是斯诺笔下的“山西娃娃”。更没有想到的是,斯诺在出版《西行漫记》时,竟把他的照片刊印在书上,而且还专门对他有一段文字描写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王东平因伤残由部队转业到山西襄汾县工作,先后担任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、区长、统战部部长等职务。他曾几次到北京看望何长工、杨尚昆等老首长,每次都是只身一人,带上干粮和水壶。当这些老首长问他有什么困难时,他总是一句话:“没有什么困难,我就是想念老首长,来看看你们。”其实,当时王东平生活相当拮据,孩子们也没有工作,但他就是不愿给国家添麻烦。

王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老伴杨玉娟是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,是一位牺牲战友的遗孀。他们膝下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。

月娃子的传奇人生,一段尘封的历史,几多感人故事,传递着长征的精神、信仰的力量,令我兴奋、激动加感动!我一气呵成,写出了《“山西娃娃”的传奇人生》,并曾改成《“山西娃娃”与斯诺的一段情》一文,先后在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晚报》《中国老年报》《时代潮》《海峡两岸》《传记文学》《中国人才》《老同志之友》《中华魂》等10多家报纸杂志上刊登。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对斯诺笔下“山西娃娃”最详实、最准确的报道。

我采访王老时,他已行动不便了,但精神尚可。我举起相机为手拿《西行漫记》,面带笑容的老人定格留影,并搀扶着老人与其合影留念。文章发表后不久,中央电视台《夕阳红》专栏记者与我联系,说要采访王东平老人。我就向王东平的儿子询问老人的情况。他的儿子说,老人家已卧病在床,不能接受采访了。我急忙到医院看望王老,那是我见王东平老人的最后一面。

1999年10月15日,王东平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平凡的一生。得知老人逝去的消息时,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,心里空落落的,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……我也很庆幸自己聆听了这位“山西娃娃”的传奇故事,让那段尘封历史没有永久尘封下去。